

# 中国人忍而后发论之文化心理学分析

姜永志<sup>1</sup>, 张海钟<sup>2</sup>

(1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2 兰州城市学院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从传统文化视角分析了中国人的忍而后发论的文化心理成因及其现实意义。分析认为, 中国人的自我观与西方人的自我观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人的自我观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 自我内涵的外延更广, 既包括了个体的我, 也包括了关系我。同时认为, 建立在传统文化之上的自我实现, 是通过中国人的“忍”来实现的, 这种“忍”被认为是一种德行、智慧和福气。

**关键词:** 中国人; 自我观; 文化; 忍而后发

**中图分类号:** B8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0)03-0058-05

中国人的自我是受中国传统文化所深深影响的自我, 其内涵与西方的自我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在社会濡化的过程中逐渐内化为具有典型文化特征的文化自我, 形成文化人格与文化的自我, 而文化的自我社会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自我实现”的过程, 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群体自我实现, 出发点不是个体, 而是个体所在的群体, 这种群体可以是国家、家庭、社团等形式的群体<sup>[1]</sup>。在这种群体自我实现的过程中, 个体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只有通过个体的修养才能达到群体的自我实现, 那么通过什么来达到这种自我实现呢? 是“忍”。中国人以传统的“忍”为德行、为智慧、为福气, 这是一种被极为推崇的德行, 儒家所谓的“圣人”若缺失了“忍”的功夫则不可能成为圣人, 可见“忍”是一种像仁爱、谦虚、孝道一样的美德而被传颂和赞美的。而“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自我的一部分, 它是怎样成为被传颂的美德呢? 他又凭借什么能够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数千年之久呢? 他到底是不是“心字头上一把刀”的

痛苦的形象表征? 一系列的思考汇聚了中国人自我的“忍”而后发论。

## 一、忍而后发论的文化基础

在中国传统思想的体系中, 对历史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儒、释、道三家, 儒家、道家、佛教三家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 经过相互对立、互相渗透、彼此转化, 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形成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 始终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 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sup>[2]</sup>。而人作为关系自我必然要在关系中被定义, 被定义的个体才具有意义, 个体的存在是以群体自我实现为目的, 而“忍”的功夫则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达成这一目的的过程既体现了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 同时也是群体自我价值的实现, 而实现过程中体现“忍”的功夫的就是忍而后发

收稿日期: 2010-03-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08XSH009)

作者简介: 姜永志(1984-), 男, 内蒙古呼伦贝尔人, 教育学硕士研究生。

思想的体现。所谓忍而后发,笔者认为:它是指个体通过积极的克制个体行为与环境的心理冲突,以群体自我实现为目的而采取的一种积极的修身心理品质或德行,是行为的暂时消退而后发力,后起的心理过程,消退以为蓄力,而后发而成仁。当然也有另一层价值取向,这种思想表现出来就是消极的顺其自然、逆来顺受、无所事事、甘为人下人,而无所为的一种心理品质,这种“忍”的品质在传统观念中是被认为可耻的、偏离道德的,是不为传统观念所认可的,因此,中国传统主流的“忍”所赞美的是一种为了群体利益而让渡个体利益的“忍”。

### (一)儒家忍而后发的思想

儒家从关系本位的自我出发,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从而达到和谐的方法在于“克己复礼为仁”,克己的目的有2个:第一是道德主体的确立,第二是维护社会秩序。儒家的超越性在于内在道德的完成,其终极关怀则在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自我的实现必须通过社会转化来完成。而“仁”虽内在于人自身,但是需要透过对自身的修养、磨练与道德的积累,才能成圣成贤。因此,为了达到“仁”这样的理想型人格样态,修身就成为每个人每天最重要的课目。透过这样修己的功夫,将社会的规范内化在自身修为之中。这也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为仁”,礼的主要目的在于制约人的私欲,使之合乎情境的要求,个体便不能按照自己的情感、愿望来做事,而是按照社会伦理道德,依当时的情境,按道德和情境所指定的合理合宜的行为来做事<sup>[3]</sup>。因此可以说,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以“仁”为道德的主体,希望透过“礼”的制约,来达成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和谐秩序的建立,完成个人生命的转化和超越的。这一转化和超越的过程便是忍而后发的过程,结果是通过“克己”对内提高自我修养以成仁,对外践行仁以达到和谐。

### (二)道家忍而后发的思想

老子论“道”,不仅对世界的本原作出了道的最高的抽象概括,而且对“道”的运动规律也作了最精辟的诠释。老子曾说:“反者道之动”。意思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就是道的规律。他认为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变动不居的原因是天地万物都存在2个互相矛盾的对立,对立面也存在相互转化。他揭示出这一系列的矛盾,如有无、难易、长短、

高下、前后、美丑、祸福、刚柔、强弱、损益、兴衰、大小、轻重、智愚、巧拙、生死、胜败、进退、攻守等,认为这些矛盾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他还深刻揭示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关系,“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认为正常能转化为反常,善良能转化为妖孽,委屈反能保全,冤枉反能伸直,低下反能充满,少取反能多得<sup>[4]</sup>。而庄子认为现实的人生处处为物所役,时时为物所累,因而他主张人应摆脱生死、福利、名利、是非的牵制,从种种束缚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人格的绝对独立,成为“至人”、“真人”、“神人”、“物物而不为物所物”,到达超越客观世界的任何规定和限制的境界。老庄“正言若反”的朴素辩证法则对中国人的智慧产生了莫大的作用,老子说的“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相对应地便有了“吃亏就是占便宜”之视弱为强、视输为赢的认知思考模式,普遍地出现在中国人之间,成为苦难或不平等的社会求生存的人生智慧。无疑,这种思维模式使得中国人“忍”的能力大大地增强<sup>[5]</sup>。这种对事物相互转化的认识正为忍而后发提供了“忍”的根据,“忍”的对立面是“不忍”,只有通过“忍”,才能达到“不忍”,“不忍”就是“而后发”,是有所为,是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的哲学,是实现群体自我意识的思想源泉。

### (三)佛家忍而后发的思想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便不断沿着中国文化的轨迹演变、适应和发展。在这种演变中,佛教曾与中国原有的传统思想发生过激烈的论争,在经过彼此融合之后产生了理论上的修正,从而形成了中国本土的佛教理论和宗派体系,其中又以融合儒、道两家学说,强调“梵我合一”的唯心世界观,“明心见性”的当下顿悟以及“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的禅宗,对于传统中国的民族性格有着深远的影响<sup>[6]</sup>。佛教认为我们要从有限存在的凡夫众生,转变为无限存在的大解脱者。凡夫众生的忧悲苦恼和生老病死,均是由于对幻景的贪求、嗔拒、无智慧而被幻景所左右,以致于身陷幻景的有限之中,要遵循一定的规律以从幻景之中走出来,就要在修身过程中强调通过“苦、集、灭、道”的四圣谛法灭除贪欲、无知及妄念,以获得真理,使自己具有智慧,并觉悟本性。这是佛家忍而后发的思想,希望通过戒贪欲、除欲望这

种主动的自我压抑、自我克制,来达到修养心性、体悟禅的奥妙,从而认识无限世界。

## 二、忍而后发论的两极对立形态及其辩证关系

中国古代是农业本位的社会,重农虽然是历代统治者奉行的基本国策,但是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境况,却是十分艰难的。农作是重体力劳动,故农耕一直有“力田”之说,“力田”是非常艰苦的,“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sup>[2]</sup>在“力田”的古代世界,生存本来已属不易,必须吃苦耐劳,才能承担起春耕夏耘的沉重劳作,而苛捐杂税与灾害,更使得这种生存方式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与挑战。面对这种考验与挑战,如果不铤而走险地起义与造反,就只能忍耐再忍耐,坚韧再坚韧,其他别无选择。因此,这种古老的农业本位社会创造了中国“农业+伦理”的文明模式和“经验+实用”的文化精神<sup>[7]</sup>。在这种文明模式和文化精神的背景下,中国人常常生活在无尽的等待、盼望之中,难以施展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缺乏进取、冒险的锐气,形成了中国人特殊的忍耐力。这种“忍”的无可奈何,是建立在生存没有保障,物竞天择的残酷环境之中,不是他们只想“忍”而不想“而后发”,而是他们连“后发”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天道在农业社会是不可逆的。而对于政治的“忍”,则是在专制条件下,不学会忍耐,也就难以生存,只有“有怨而无怒”、无可奈何、消极被动的忍受。

自然界的挑战与人类的应战是人类文明产生的源泉。自然条件的恶劣程度,人类的应战程度,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挑战的程度超越了人类的应战能力会产生人类屈服自然的无可奈何的忍耐,这种忍耐是不会有后发之力。人们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无时不遇到各种各样内部、外部的困难,这些困难阻抑着人们达到一定目的、满足一定愿望的夙求。在每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人们都会面临2种情况:一种是困难克服一目的达到—情感愉悦—有成就感;一种是困难较大—目的受阻—精神低落—有挫折感。中国古人所处环境十分艰险,当无力改变这种境况时就迫使他们必

须接受现实、面对现实,选择忍耐,忍耐之泛化便成为一种群体性格。这种性格是胆汁质与黏液质的矛盾组合,性情刚烈而又老成持重,坦白直率而又少于言谈,易怒易躁而又固执淡漠,忍耐其实源于无奈<sup>[8]</sup>。这也使得中国人对社会与环境只能是“忍”的无可奈何,不能积极主动地构建理想的社会,不能达成理想的人格,原因是他们没有生存权。在自然的挑战与人的应战未能达到平衡时,这种境况就是古老农耕社会的现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具有如天道般的不可逆性。

当自然的挑战与人的应战达到一种动态平衡之后,人类便创造了文明,在文明之下便产生了各种文化模式,这些文化模式是适应生存的产物。中国的文化模式就是在挑战与应战的循环关系中建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伦理道德关系为本位的社会机制。在这种关系本位社会中,“忍”的无可奈何与“后发”的有气无力相对立就是“忍”的奋发有为与“后发”的生机勃勃,所谓“忍”的奋发有为与“后发”的生机勃勃,是指儒家所说的“克己以成仁”,道家的“忍”即“不忍”的以退为进,佛家说的“体悟禅对无限世界的认识”,这里的“忍”多是在具备一定“不忍”的条件之下的“忍”,即知道“忍”的结果是“仁”、“道”、“佛”。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积极主动的行为,有其弘毅坚韧的一面<sup>[9]</sup>。在此意义上,“忍”是为了未来的理想与抱负而自觉承受眼前的困厄,是为了明天而牺牲眼前,这里的“自损”实则包含了顽强不屈、奋进不止的“忍”的精神。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对于一切有志于这一伟大理想的仁人志士来说,是“忍”的奋发有为与“后发”的生机勃勃。因此,在此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忍”乃是先人设计的一种为追求“外王”大业而反躬自求的“内圣”功夫,也是一种特殊的人格自我锤炼方法。实际上,传统文化中“忍”的一大要义正在“增益其所不能”的基础上,是在弘扬人格的坚韧性,其退让不是出于惧怕和胆怯,而是出于更远大的目标与使命的考量,并为此而无怨无悔地忍受当下的屈辱与磨难<sup>[10]</sup>。因此,这种忍受形似怯懦,但其底蕴却是明确的人生信念、刚强的人格精神和强大的抗打击能力,这就是所谓的“忍”的奋发有为与“后发”的生机勃勃思想。

### 三、忍而后发的现实意义

传统文化中已经蕴含着丰富的忍而后发的思想,明恩溥也曾曾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专列一章讨论中国人的忍耐,他认为中国人的“忍”主要表现为毫无怨言的等待和默默的忍受。他认为检验一个中国人的品性,真正的方法是研究他处于风雨交加、饥寒交迫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如果检验结果令人满意,就“温暖他,擦干他,让他吃饱,使他成为天使”<sup>[11]</sup>。他所说的“毫无怨言的等待和默默的忍受”,其实一方面包含着无可奈何,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忍而后发的思想,所以最后才会“温暖他,擦干他,让他吃饱,使他成为天使”。这就说明“忍”含有屈而后伸、前瞻致远的精神。可以说,“忍”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工具性意义,但忍而后发却表现为明显的现实工具性意义。首先,通过“忍”可以避免人际冲突,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国人平衡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的根本准则是“尚和”,为了达到“和”的目的,中国人经常要用“忍”的策略来应对<sup>[12]</sup>。“尚和”体现“忍”的目的,“后发”的结果就是达到和谐,和谐就是儒家所追求的“行仁”的结果,也是其追求的最高目标。其次,通过“忍”可以避祸祛灾,平安保身,达到海阔天空的境界。若是在出现心理冲动的时候不忍,轻则生事伤财,重则损身积怨。最后,通过“忍”可以成事,增长见识,出人头地,求得富贵利益。在立事的过程中,通过“忍”可以应对突然的变故,还可以避免因为自己的急躁、轻忽等性格造成重大事故。因此,“忍”不等于忍而后发,“忍”的工具性不如忍而后发强烈,“忍”既可以是积极主动的,也可以是消极被动的;既可以是无可奈何之“忍”,也可以是奋发有为之“忍”。而忍而后发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奋发有为的、工具性的、道德的、智慧的、福祉的。二者具有明显的区分属性,忍而后发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同时也是构成中国人和谐心理观的核心要素之一。

###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人的自我观是一种伦理道德自我、关系自我、宗族自我、集群自我,同时也是典型文

化自我。基于传统文化上的中国人的自我观,并非如西方文化所言的那样是一种关系自我而忽略个体自我的成长。恰恰不是这样,中国传统的个体自我与关系自我却是并列发展的,个体通过“克己成仁”达到修养心性和构建和谐的目的,达到自我对内的“内圣”和自我对外的“外王”,而这种达到个体自我与关系自我双赢的策略就是忍而后发的思想,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忍”并不是“心字头上一把刀”的痛苦的形象表征,而是作为一种积极的、主动的行为,有其弘毅坚韧的一面,因此,才会以“忍”为德,以“忍”为福,以“忍”为智慧,才会被传颂千年而不衰。这种忍而后发思想中2种相反的两极对立形态,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以中国本土文化为指向的,努力褒扬“忍”的奋发有为与“后发”的生机勃勃,将有利于个体自我与关系自我的和谐发展,有利于消解心理与环境的矛盾冲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构建。

#### 参考文献:

- [1] 陆 洛.人我关系之界定:“折衷自我”的现身[J].本土心理学研究(台北),2003(20):139-207.
- [2] 胡发贵.论中国传统文化之“忍”[J].社会科学战线,2003,26(4):20-24
- [3] 杨国枢,陆 洛.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 [4] 张海钟.人性、人生、人格[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5] 李敏龙,杨国枢.中国人的忍:概念分析与实证研究[M].台北:桂冠图书公司,2000
- [6] 葛鲁嘉.本土心性心理学对人格心理的独特探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3(6):125-130
- [7] 刘承华.文化与人格[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
- [8] 张海钟.河西走廊农民社会心理的多学科现象学分析[J].科学·经济·社会,2003,21(4):9-14
- [9] 陈 萍.中国人尚忍心态的心理学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
- [10] 杨慧芳,郭永玉,钟 年.文化与人格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心理学探新,2007,27(1):3-8
- [11]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2] 汪凤炎.“尚和”: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4(1):106-112

##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greatness after the ren of Chinese people

JIANG Yong-zhi<sup>1</sup>, ZHANG Hai-zhong<sup>2</sup>

(1. School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Lanzhou City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Abstract**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lf of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 is that the self is built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onnotation of self is broader, including person and self of relationship. The self realization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ren. It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virtues, wisdom and bless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 series of thinking of ren,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dea of greatness after the ren to reveal the real connotation of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 Chinese people; self culture; the greatness after the ren

(上接第 17页)

以类取之。”黄帝发明舟楫,就是在以前渡河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一段粗大的树干,先用火烧去中间部分,然后用石斧砍制成形,制成独木舟的样子,然后又用火烤制木桨。舟楫的制造使得古人的水路交通便利起来。

### 五、结 语

从衣食住行 4个方面复原黄帝时代华夏先民物质生活所表明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相较新石器时期

黄帝时代已进入一个相对文明的社会。房屋的建造、服饰的制作、火的使用、炉灶以及谷物加工与熟食器具的发明创新充分展现了华夏人文始祖黄帝对人类文明的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 [1] 张松林. 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初考[J]. 中原文物, 1997, 21(3): 75-88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宝鸡北首岭[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

## Material life in the imperial time

HE Bing-wu, DANG Bin

(Institute of Ancient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Culture, Sha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Xi'an 710065,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in this paper collect all the necessary documents from the historical books to study the material life in the imperial time from clothing, food, dwelling and travelling.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mperors in that time had already entered the civilized life in the above four aspects, which indicates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ir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formation of civiliz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 emperor; Chinese civilizatio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clothing; food; dwelling and travelling